

---

## 也談「我」的艱難 回應張文強教授的〈關於研究工作的幾個思考〉

唐士哲\*

---

張文強教授的〈關於研究工作的幾個思考〉，對於學術研究的資本化現狀提出了重要的反思。文中剖析了台灣學術環境的資本化現象，如何體現在研究環境衍生出猶如生產線上拼績效、重視競爭與效率的機制。以及這樣的結構條件下，學術場域的成員如何為了圖生存，而使得經驗研究的內涵日趨形式化的問題。

文強教授點出了學術資本化的後果，是研究工作的私人化傾向，即管理主義的時效要求下，研究者為了拼論文數，日趨獨善其身，大學校園不再是公開論辯的園地。他因此也對當下結構的困境有所回應。在掙脫形式主義的「無我」、重拾自由意志與基於生活經驗的「我的研究」前提下，文強教授主張研究工作應該重拾藝匠的精神，包括研究主題的發想、研究與書寫邏輯應回歸初心，根植於自我日常生活經驗與觀察。

文強教授擔任《傳播文化》主編多年。期間經手學術文章不知凡幾，因此文章中的提出的反思陳辭剴切。他雖然自謙是主觀且大膽，但對於當下學術環境裡研究形式化的沈痾有獨到的觀察。包括研究方法先於研究主題、制式地利用經驗資料確證或否證擇定的理論，以及概念或理論討論被壓縮為文獻檢閱，都是經驗研究為什麼越來越像罐頭論文的病灶。我曾經在文強教授任主編時期擔任《傳播文化》的編委，也在其他兩個期刊擔任主編或執行編輯。或許基於此，主編陳雅惠教授囑我提供一篇回應文。我不揣淺陋，在文強教授的「結構困境」宏旨下，提出一些脈絡化的觀察。回應文強教授主張「我的研究」的重要性，以下也淺談一下「我」的艱難。

文強教授談到傳播研究的形式主義，正面觀之，是作為「學門」自主意識的提昇。簡單而言，傳播作為一個獨立運作的學術環境，有一套可以重複

---

\* 唐士哲為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，聯絡方式：shihjet@gmail.com

驗證的典範理論、幾個可供操作的研究方法，以及一些範圍清楚、不須費心定義的研究對象。這些是構成研究「技藝」(craftsmanship)可以依循的工具包，也是傳播研究作為學術領域的常規化知識。當然工具包的內容組合因時間而有不同，也因特定傳播技術的出現而能精進，例如手機的使用以及社群媒體平台的普及，皆相當程度改變了抽樣與資料產生的定義。但萬變不離其宗，樣本的群體代表性仍是認證資料價值的規範原則。傳播學者在教學、研究實踐過程中的探索、研究經驗的累積，以及透過教學傳承這些經驗，皆因這些工具包的內容組合而在專業身份與認同上得以獲得確認。在高教環境裡，它們也是學者可以安身立命的常規化實踐。包括進入研究領域的大學、研究所學生，在理論、研究方法課堂上，也必須是由熟知這些工具組合的使用開始做研究。工具包提供幾套語言，使得基於不同關切旨趣的學術同好可以對話、溝通，甚至論辯。而學術生態裡，也有相關的實踐或活動維繫這種溝通對話的場域氛圍，包括理論教科書的典律化、學會組織、研討會、研究計畫的獎勵補助、學術期刊的審查機制等。

當然研究會淪為形式主義，也壞在是否社會科學研究的內涵僅止於此，不作他圖。文強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的問題，便是工具包的組合漸趨固定，且越來越成為學院內知識實踐的公式化按表操課。當社會現象變遷快速，難以有普世皆準的通用理論，實證研究如果只是在一個只有固定工具組合的工具箱裡挑選理論、擇定研究方法，產生的結果便是研究成果成了套套邏輯 (tautology)，只能驗證既存的理論或概念為真，沒有與時俱進的探索、質疑、超越或推翻。理論化因此產生停滯的狀態，研究的產出充滿了社會學家布魯默 (Herbert Blumer) 所言的「定義型概念」(definitive concepts) 的操作，即理論之為用，僅在於能夠提供基準 (benchmark)，統攝地解釋一整類別特徵類似的現象 (Blumer, 1954)。當概念定義清楚、現象經過地裁剪可以對號入座前者，每個研究都長得手腳齊全，研究方法操作的工整潔癖，對照的便是理論的貧乏。

即便傳播研究已然是學門，但回顧過往，一路走來經歷不同歷史階段，似乎始終脫離不了理論貧乏的景況。近期關於傳播研究的理論貧乏，李金銓曾套用人類學家紀爾茲 (Clifford Geertz) 的「involution」一詞，形容這是學

門知識產生的「內眷化」，即抱住小題目，力求方法技術精益求精，但問題越問越小。即便在學門的圈圈裡強化了研究者的心理安全感，卻婉拒與外界往來的壓力（李金銓，2019）。

「理論的貧乏」正是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湯普遜（E. P. Thompson）在 1978 年出版的一本書的書名。以「政治書寫」（political writing）自居，湯普遜不忌談研究就是政治立場上的表態。《理論的貧乏》（*The Poverty of Theory*）唱同時代鴻儒的反調，既批判冷戰時期西方學術份子的冷漠，也打臉阿圖塞式的結構主義分析忽略了歷史。即便對於曾屬於同陣營的《新左評論》（*New Left Review*），他的批評同樣不假辭色，因為他難以苟同一些貶低英國勞動階級，並且自我感覺良好的文章。唱反調的辯證（polemic）可能突顯了一個孤僻且尖酸刻薄的湯普遜，但該書也是誘發一連串後續質疑、討論、對話或抗辯的觸媒之作。

然而 1970 年代英國的學術場景，與隔了近半世紀的今日，自然無法同等而論。學術場域經歷 1990 年代的全球化浪潮，如今任何的在地學術實踐，都以全球作為參考指標。大學科系論世界排名、期刊有了影響因子係數，而學會作為觀念交流的論壇，只要掛上「國際」或「世界」的頭銜便使得全球學者趨之若鶩。這些現象皆導致理論貧乏之外，更彰顯在地學術場景的貧乏。英文作為國際通用的學術語言，使得不同的在地學者皆可以擇良木而棲，「放眼國際」。而著重英文發表作為大學校園內的升等、考評機制，同樣不利於學術圈在同文同種的環境中形成對話。以期刊被賦予的等第評價個別學術發表的成績，除了使得大家都在拼論文數量、期刊影響係數，以及單篇論文的引用次數，研究成果成了「產值」的兌現。自發的學術討論不易形成，更遑論產生思想碰撞的火花。大學成了米爾斯（C. Wright Mills, 1951）筆下的制度封建，研究與教學成為一種精英主義封閉環境裡的相安無事與平庸。

我認為上述這些結構的困境，都是造成形式主義當道的關鍵因素。反求諸己，希望掙脫結構的束縛，開展人文社會研究的各種可能當然至關重要。布魯默希望社會科學研究在定義型概念之外，也能夠開發有助於觸發觀念思考的「敏感型概念」（sensitizing concepts），這些概念沒有明確的指涉範圍、容許創造性的模糊，研究者的主觀不只被容許，甚至是概念化的起點。然而

大學當前的教、研環境，是否還能鼓勵這樣的研究需要的寬裕時間與單純動因，恐怕更是關鍵問題。兩個世紀前，開創當代大學制度採教學、研究合一的德國教育家洪堡（Wilhelm von Humboldt, 1818）曾主張，所謂大學，無非是人類的精神生活受到外在的閒適與內心的壓力驅使，所開展的學習與研究。他認為當代的大學作為一個制度，應該容得下活絡且隨興的人為運作，確保有人可以閉關省思、有人可以與同儕互動、也有人可以開班授徒（見 Chomsky, 1969）。保障研究者內心的壓力作為研究的動因，必須以環境的閒適為前提。但或許當前談「我」的艱難處，正在於顛倒了這個內、外的動因：教、研環境日趨走向效能管理的外在壓力，正在迫使制度裡的成員追求形式化的研究以提供內心的安適。

### 參考文獻

- 李金銓（2019）。《傳播縱橫》。台北：聯經。
- Blumer, H. (1954). 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? *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*, 19(1), 3-10.
- Chomsky, N. (1969). 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n a time of crisis. In R. M. Hutchins & M. J. Adler (Eds.), *The Great Ideas Today Nineteen Sixty-Nine*. Chicago: Encyclopedia Britannica. (The version is excerpted from The Noam Chomsky website. Download: <https://chomsky.info/1969/>)
- Mills, C. W. (1951). *White collar: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*.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Thompson, E. P. (1978). *The poverty of theory & other essays*. London: Merlin.